

民主與威權的制度績效： 亞洲四小龍政治經濟發展的量化分析

林宗弘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博士班候選人

摘要

本文將有關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政權轉型的學術觀點區分為“亞洲例外論”與“普世主義論”兩組論述，亞洲例外論認為遵循亞洲價值的威權體制有助於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平等，普世主義論則認為民主化才有助於保證經濟穩定與分配正義。在南韓與台灣相繼發生政治轉型之後，與民主改革停滯不前的新加坡及香港相比，形成了極佳的對照。

本文引進反事實推論的 Treatment Regression 統計方法以及 General Method of Moments 模型，收集亞洲四小龍近三十年來的相關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博士候選人，本文榮獲 2006 年台灣政治學會學術研討會年度最佳論文獎，部分數據修改自作者於 2005 年香港社會學年會發表之論文 Lin, Thung-Hong. 2005. “Does Democracy Matter? Political Transition, Social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of Four Asian Tigers.” Article presented at December 3, 2005, Conference of HKSA Annual Meeting, 感謝台灣政治學會年會評選年度最佳論文獎的匿名審稿人，香港科技大學吳曉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馬嶽教授的指導、香港科大李兵、韓佳在統計方面的協助，台灣政治學會研討會上台大國發所周志邦教授與中山政治所趙建民教授的評論，以及台灣政治學刊兩位匿名審查教授建設性的意見，筆者據之作了重要的修正。但文中仍有錯誤是筆者之責任。

◎《台灣政治學刊》第十一卷第一期，頁 175-238，2007 年 6 月出版。

數據，來比較南韓、台灣、新加坡以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影響。結論發現亞洲四小龍的政治轉型與否，與實質經濟成長率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統計關聯，但是比起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及南韓，香港和新加坡的吉尼係數有顯著惡化的趨勢。因此，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經驗，並不支持亞洲威權體制表現較佳的“亞洲例外論”，反而成爲民主作爲普世價值的另一次驗證。

關鍵字：民主、所得分配、經濟成長、吉尼係數、政治轉型、福利國家

壹、前言

在第三波民主化逐漸退潮之後 (Huntington 1991)，亞洲的新興民主似乎深陷危機；台灣與南韓政黨輪替之後的新政權，相繼爆發無止盡的貪腐醜聞，泰國十五年來的民主轉型毀於一夕之間，而菲律賓與印尼仍無法擺脫軍事政變的陰影。在上個世紀末，許多政治學者將研究焦點由轉型的政治過程轉向民主鞏固的條件，認爲要防止民主體制的倒退，不但必須在短期內防範軍事政變，逐步創造出有利於公民社會自我組織與新聞自由的制度條件，培養民眾建立民主的價值觀等等，長期還必須在政治經濟方面創造出良好的統治績效 (Diamond 1999; Linz and Stephen 1996; Schedler 2001)。但是誠如著名學者 O'Donnell 所言，政治學界對民主鞏固的探討流於「強烈的目的論風味 (strong teleological flavor)」，¹ 一方面支持民主鞏固的目標，另一方面卻不得不承認新興民主政權的統治績效有待

¹ O'Donnell 2001 的看法引自 Schedler 2001 (150)。

考驗。

那些主張「亞洲價值」的威權主義者，看到這些民主鞏固的討論，想必竊笑不已。民主的統治績效若是不如威權體制，其制度化又困難重重，這些民主的推動者「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同樣的，對台灣與南韓民眾來說，退回到威權統治鬆動的前夕，民主顯然不是唯一的選擇。這不僅反映在台灣與南韓少數民眾「懷念蔣經國」（吳乃德 2004）、或「懷念朴正熙」（Kim 2004）的現象上，更是多數仍在威權體制下討生活、受官方媒體管制下的亞洲人民的疑惑：民主真的有用嗎？

撇開民主轉型的目的論，本文希望從經驗的角度來討論東亞民主鞏固的現象。筆者認為亞洲新興民主制度存活的條件，仍需部分仰賴其制度績效，也就是政權是否能夠給予選民物質利益的回報。本文以最近三十年亞洲四小龍：台灣、南韓、新加坡與香港的數據，以經濟成長率與收入分配為指標，來衡量並且比較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的制度績效。² 在方法論上，筆者引進了「反事實推論」（counterfactual hypothesis）的統計工具，也就是所謂的「處方迴歸（Treatment Regression）」模型來估計民主化對不平等的影響，並且運用計量經濟領域近年來發展出的一般動態時序分析（General Method of Moments, GMM）來研究經濟成長。從反事實推論的分析方法出發，問題便不在

² 本文中“制度績效”一辭的定義與 Douglas C. North 相同，指涉的是政府在經濟成長與分配的表現。見 North 1990（ch.12）。某些作者，例如 Larry Diamond 則偏好使用“體制績效（regime performance）”一詞，並且區分為體制的經濟績效與政治績效，前者包括了政治體制對經濟成長與分配的效果，後者則是指保障國家安全、國內治安與對抗貪腐的能力（Diamond 1999, 77-93）。筆者此處對制度績效的定義等同於體制的經濟績效。

於民主是否有用，而在於台灣與南韓若沒有民主是否會變得更好，或是香港與新加坡若擺脫威權體制是否會變得更糟？

本文對亞洲四小龍政經數據的統計分析發現，在全球各國國內不平等持續擴大的同時 (Alderson and Nielsen 2002)，1992 年之後的南韓與 1996 年之後的台灣，其民主化刺激了福利國家政策的擴張，有效減緩了收入分配的惡化，而經濟表現並未受創，這是新興民主秩序得以存活下來的重要原因。相反地，主張「亞洲價值」的新加坡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其經濟績效並不具有相對優勢，但是威權體制下的收入分配卻急遽惡化。本文同時檢驗了過去對亞洲四小龍政治經濟發展的種種理論，發現以四小龍為例的「亞洲例外論」(Asian Exceptionalism)，其多數學說都經不起經驗檢證。

一、普世主義論 VS. 亞洲例外論

有關民主、收入不平等與經濟成長之間關係的社會科學文獻多如牛毛，其爭論隨著更新的統計模型與更完整的數據庫而與時俱進，由於資料上的限制，本文不擬回顧這些以全球跨國數據為基礎的研究，也不打算涉入全球範圍內民主體制是否促進經濟增長 (Barro 1999; Bollen and Jackman 1985; de Soysa 2003; Feng 2003; Krieckhaus 2004; Muller 1988;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3)、威權體制崩潰的決定因素 (Carothers 2002; Diamond 2002; Geddes 2004)、民主轉型的現代化前提是否成立 (Boix and Stokes 2003; Epstein, Bates, Goldstone, Kristensen, and O'Halloran 2006; Lipset 1959; Muller 1995;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7)、民主化的過程是否導致分配平等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 Lee 2005)、與不平等是否傷害經濟成長 (Deininger and Squire 1998; Forbes 2000; Knack and Keefer 1997; Knowles 2005) 等重大爭論。但上述的研究成果,多數是從「普世主義」(Universalism)的角度出發,探討一般政治經濟理論的適用性,反之,本文將集中研究關於亞洲四小龍作為一般理論典範的異端(anomalies),也就是「亞洲例外論」所引起的爭議上。

(一) 威權有助於成長?

在 1993 年,世界銀行(World Bank)出版了《東亞奇蹟》(*East Asian Miracle*)報告,以東亞經濟體的經驗為例,主張發展中國家去管制化與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是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World Bank 1993)。大約與此同時,1994 年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引發了有關「亞洲價值」的爭論(Zakaria 1994)。簡言之,李光耀認為由於東亞威權體制能夠保證「賢能政治(Meritocracy)」的統治,為這個地區的經濟體帶來了長期發展與穩定的社會秩序。因此,亞洲威權政體有助於經濟成長的理論,後來被稱為「李光耀假說(Lee's Hypothesis)」。以台灣為例的發展國家理論學者 Robert Wade 也持類似看法。³ 然而,1997 年的金融風暴使得此一論述大為失色,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政府公開指責國際資金對亞洲各國匯率的炒作,印尼更在這一波經濟危機中經歷了政治轉型,但中國大陸一黨專政下的高速成長,仍使得威權主義

³ Robert Wade 認為新興工業國家應該“在政治體系民主化之前發展出行使政治權威的有效制度 (develop effective institutions of political authority before the system is democratized.)” Wade (1990, 372)。

的支持者津津樂道。

反對「亞洲價值」觀的東亞政治人物不在少數，包括南韓與台灣的民選總統金大中（Kim 1994）與李登輝等，在學術界著名者則有法蘭西斯福山（Fukuyama 1998）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後者更以「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為題專文反駁李光耀（Sen 1999b）。Sen 等人認為民主雖然未必能直接促成經濟成長，卻有助於避免飢荒、文盲等資源分配不平等所導致的最糟後果（Sen 1999a）。借用這場論辯之中雙方所提出的概念，筆者將解釋東亞政治經濟發展的兩個理論陣營，稱為「普世主義論」與「亞洲例外論」。

（二）成長有助於平等？

在亞洲例外論當中經常受政治經濟學者引述的「台灣奇蹟」，主要集中在所謂「成長且平等」（Growth and Equity）的特殊經驗上。在 Simon Kuznets（1955）討論不平等的經典原文中認為，工業化將造成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但在民主體制下，城市中下階級的政治參與將會導致政府對收入的重新分配，因而形成一個不平等先上升後下降的倒 U 型曲線。⁴ 台灣經驗被認為是倒 U 型曲線的反例，費景漢等人指出，台灣戰後

⁴ 不幸的是，Kuznets 對吉尼係數（Gini's Coefficient）下降的政治學解釋，經常遭到經濟學者誤解為產業結構變化的規律。Kuznets 本來的論點是：政治改革才會導致收入重分配與不平等的降低。原文為：“In democratic societies the growing political power of the urban lower-income groups led to a variety of protective and supporting legislation, much of it aimed to counteract the worst effects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o support the claims of the broad masses for more adequate shares of the growing income of the country（Kuznets 1955, 8）”經濟學界則常將倒 U 曲線解釋為「產業雙元論」或經濟成長果實篩落的現象，而不是 Kuznets 本人的觀點。見 Robinson 1976。

早期的土地改革成功地降低了財富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工業化初期伴隨著社會不平等的下降，擺脫了「Kuznets 倒 U 曲線」(Kuznets's inverted-U curve) 的規律 (Fei, Ranis, and Kuo 1979)。此一觀點被早期的香港與南韓研究所當然地引用與延伸，甚至認為是新古典成長理論的貢獻 (Chow and Papanek 1981; Field 1984)。臺灣經驗雖然因此獲得發展經濟學界的重視 (Alesina and Rodrik 1994)，反覆引述，卻未見進一步的統計檢驗。經濟成長可能自動篩落而達成所得分配的平等嗎？

本文對台灣「成長且平等」的論點提出疑問與修正。土地改革的影響，與其說是成長可以兼顧平等，倒不如說是發展起點的平等有助於成長。在日本、台灣、南韓與中國大陸，土地改革對長期經濟成長的貢獻無庸置疑 (Deininger and Squire 1998; Haggard 2005)。然而成長並不會直接導致平等的收入分配，若是將早年不十分確定的吉尼係數擱置，⁵ 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關係，仍然是 Kuznets 曲線的典型。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吉尼係數只有上升而不會自動下降，導致台灣、南韓、香港與新加坡走上分歧之路的制度變遷，其實是政治轉型。

從台灣與南韓社會福利體制擴張的經驗來看，民主化過程裏中下階層選民的壓力，才是政府企圖控制貧富差距的主因。新加坡與香港的經驗恰好成為強烈的對比，這兩個威權體制治

⁵ 在費景漢等人的研究中，1959 年的吉尼係數是 0.558，1961 年則是 0.440，這兩個點是台灣違反 Kuznets 曲線的主要論據，但是有研究者指出此一原始數據十分可疑，不能確信 (Haggard 1990)。

理下的城市國家，對勞動力市場自由放任的改革有限，如今已經成爲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社會（見表一）。

表一：東亞四小龍與三種福利國家體制收入分配的比較

各種不同類型的福利國家	年度	最高 20%與最低 20%所得組的家戶平均收入比 (a)	吉尼係數 (a)
自由主義福利國家 (b)			
美國	2002	10.20	0.405
紐西蘭	1997	6.84	0.362
加拿大	1998	5.77	0.331
英國	1999	7.21	0.360
澳大利亞	1994	7.00	0.352
統合主義福利國家 (b)			
義大利	2000	6.46	0.360
日本	1999	4.84	0.301
法國	1995	5.60	0.327
德國	2000	4.34	0.283
社會民主福利國家 (b)			
芬蘭	2000	3.82	0.269
瑞典	2000	4.02	0.250
挪威	2000	3.88	0.258
荷蘭	1994	5.54	0.326
亞洲威權城市國家 (c)			
香港	2001	17.66	0.525
新加坡	2000	20.91	0.481
亞洲新興民主政權 (c)			
台灣	2003	6.07	0.343
南韓	2000	6.84	0.352

Source :

(a) 最高 20% 與最低 20% 所得組的家戶平均收入比與吉尼係數來自中華民國統計年鑑 (2004; 2003 表 7)。

(b) 福利國家的政權分類來自 Esping-Anderson (1990, 27-29)。

(c) 亞洲四小龍的政權分類爲作者所加。

二、民主有助於平等？

近年來的民主研究，多數肯定民主轉型與重分配之間的因果關係（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在威權主義下，亞洲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多偏好保障軍公教人員與國營企業員工等附屬於行政體系的支持者，但民主化改變了再分配體制。南韓與台灣分別在民主化過程中爆發了工潮與各種社會運動（Hsiao 1990; Koo 2001），政府因為選舉競爭而大規模擴張了以行業保險為主的社會福利，包括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1997 年金融風暴期間形成的失業保險、以及國民年金體系等（見表二）。這些保險制度近似日本與德國等，即 Esping-Anderson 所謂的統合主義福利體制（Esping-Anderson 1990），儘管台灣與南韓的福利政策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甚小，而且對勞動體制彈性化的限制也較弱，效果上與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的差異不大，⁶ 但仍然形成了基本的社會安全網，有助於防止失業者或是最低所得組別中的家戶所得下滑。

⁶ 工會組織率低可能是導致台灣與南韓無法形成社會民主體制的主要原因，東亞福利國家的相關研究可以參見 Holliday and Wilding 2005 (ch.7)；或見 Joseph Wong 2004。

表二：南韓與台灣社會福利體制在民主化過程中的發展

政治轉型期	南韓社會福利政策的變化	台灣社會福利政策的變化
民主化以前 南韓 (1963-1987) 台灣 (1950-1987)	軍人年金制度的建立 (1963) 對 500 人以上的企業單位 實施職業災害保險 (1964) 對政府公務員、公私立學 校教師與 500 人以上企 業單位實施的健康保險 (1977) 民主化前夕將職業災害保 險與健康保險擴大到 16 個員工以上的企業單位 (1986)	職業軍人保險實施 (1950) 公務人員保險實施 (1958) 員工 5 人以上的事業單 位實施勞工保險 (1958) 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保險 (1980) 勞動基準法 實施 (1984) 但僅包括以藍領工人為主 的行業，包括未強制提撥 的企業退休金
民主化期間 南韓 (1987-1992) 台灣 (1987-1996)	年金改革計畫 (1988) 將 退休金制度擴大到十人 以上的企業單位 健康保險與職業災害保險 擴大到絕大多數雇員 (1988-89) 改革勞動法，設立最低工 資 (1988-90)	全民健康保險立法 (1994) 於 1995 年實施，涵蓋絕大 多數公民 勞動基準法 (1996) 修正 為受雇者一體適用
民主鞏固期 南韓 (1992-) 台灣 (1996-)	退休金制度擴大到五人 以上事業單位 (1992) 失業保險開辦 (1995) 退休年金制度改革，涵蓋 絕大多數公民 (1997)	勞工保險開辦失業津貼 (1998) 就業保險法通過 (2002) 勞工退休金新制通過，涵 蓋絕大多數受雇者 (2004)

資料來源：

- (a) 民主化時期的區分依據自由之家指數 (見後文)。南韓福利體制的變遷資料來自 Woo 2004 (143-47)；台灣 1997 年之前的資料見 Ku 1997 (250-56)。1997 年之後的台灣福利體制變遷為筆者所加。

此外，南韓與台灣分別在民主化期間展開教育改革，擴大高等教育的入學率，與香港及新加坡的高等教育精英主義相比，有可能減弱了人力資本對不平等的影響。⁷ 整體來說，雖然台灣與南韓的吉尼係數仍持續擴張，但透過政府移轉性收入調整過後，仍有減輕不平等進一步惡化的作用（Haggard 2005）。

相對而言，香港與新加坡政府十分排斥勞動力去商品化的政策。首先，針對貧窮問題，威權政體偏好殘補式的社會福利政策，例如香港的綜合援助，星港兩地至今沒有制度化的最低工資與失業保險。其次，現存的普及式社會福利多數是英國殖民時期的制度遺產。香港 1970 年代初期公屋比例大幅擴張，是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執政時期對付左派抗爭活動的直接反應，以此來疏散當時油尖旺勞工暴動集中地區的寮屋人口（Castells, Goh, and Kwok 1990），而星港兩地的公醫制度則是戰後英國殖民體制衛生政策的延續。結果，除了公屋與公醫體系之外，獅城與香港勞工階級普遍缺乏失業救濟與基本工資的保護。

第三，星港兩地的退休年金體制也缺乏所得重分配的效果。星國人民行動黨執政後，透過個人強制繳納的中央儲蓄基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來支付退休金並開放公屋貸款，以此注入資金到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⁷ 周志邦教授提醒筆者教育改革可能導致人力資本的分配更不平均，但筆者用意是與大學入學率有限的香港及新加坡相比。目前對台灣高等教育擴張與收入不平等關聯的研究仍十分欠缺，人力資本吉尼係數影響所得吉尼係數與經濟成長的跨國比較，見 Castelló and Doménech 2001。

EDB) 旗下的政府控制企業 (Government Linked Companies) 以及房屋發展局 (House Development Bureau) 的建設項目, 執政精英可以透過同時控制基金流向與房屋供給而獲利 (Hamilton-Hart 2000; Low 2004; Rodan 1989; Tremewan 1994), 香港則直到回歸後的 2002 年, 才仿照新加坡實施強制退休基金。最後, 高等教育入學率在新加坡與香港的比例相對偏低, 可能導致人力資本擴大不平等的後果 (見表三)。

新加坡與香港以房地產與金融服務業為主的產業政策導致基尼係數持續提高。英國殖民時期的土地國有與嚴格限制轉讓的公屋政策, 使得私人住房與工商業房產二級市場供給短缺, 而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炒作的對象。總之, 星港兩地威權體制的福利政策不僅無助於壓制貧富差距的擴張, 反而使得社會資源分配加速集中於擁有土地與金融資產的中上階級。⁸ 近年來, 台灣與南韓前五分之一最高所得組的平均收入約為最低所得組平均收入的六至七倍, 香港為十七倍多, 而新加坡則高達近二十一倍。因此, 福利國家的制度設計與政治轉型, 已經導致了台韓與星港之間所得分配的重大分歧。

⁸ 香港與新加坡公屋與個人帳戶公積金發展的細節可參見 Low and Choon 2004 以及 Castells, Goh, and Kwok 1990。新加坡公屋政策如何成為威權體制組織控制人民的工具, 可以參考 Kong and Yeoh 2003 或 Chua 1997。香港目前已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糟的地區, 而高失業率與新移民的低所得是導致貧窮最重要的因素 (Zhan et al. 2004), 香港金融與房地產炒作所造成的財富集中化, 參見 Smart and Lee 2003。香港與新加坡公屋與土地政策對房地產開發的推波助瀾, 見 Anne Haila 2000。

表三：迄2005年底為止東亞四小龍的福利體制比較

	香港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公共醫療或全民健保	√	√	√	√
普及式年金或退休金	√	√	√	√
最低工資立法	×	×	√	√
公立初等與中等教育	√	√	√	√
高等教育擴張	少	少	√	√
失業保險	×	×	√	√
公共房屋	√	√	少	×
累進稅	×	×	×	×

資料來源：

- (1) 修改自 Tang 2000 (141) 與 Low 2004 (ch.4) 由於前述研究對台灣與香港的福利政策改變沿用舊資料，筆者修正如下：香港強基金建立於 2002 年，而台灣的失業保險法在 2002 年通過，勞工退休金新制於 2005 年實施。
- (2) 在台灣，居住於國民住宅的人口僅佔 3%，多數是軍公教人員。亞洲四小龍的房屋政策差異，見 Li 1998 (ch. 2)。

三、亞洲成長的動力

最後，本文將對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的因素作進一步的檢證。首先，傳統的經濟成長研究源自新古典經濟學，將資本與勞動等生產要素納入對經濟成長的解釋 (Solow 1956)。其次，則是「出口導向」與農部門勞動力過剩的比較優勢理論，強調外資與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在新興工業國家刺激成長的作用 (Haggard 1990)；第三，與之對立的是 1970 年代盛行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 以及其後繼的世界體系理論，將核心與邊陲地區之間的不平等交換結構納入考慮，差別在於依賴理論提倡進口替代政策，認為必須擺脫核心與邊陲的剝削關係，才能促進發展 (Frank 1969)，世界體系論則接受「依賴性發展」的可能性，但仍然強調亞洲四小龍壓低工資剝削出口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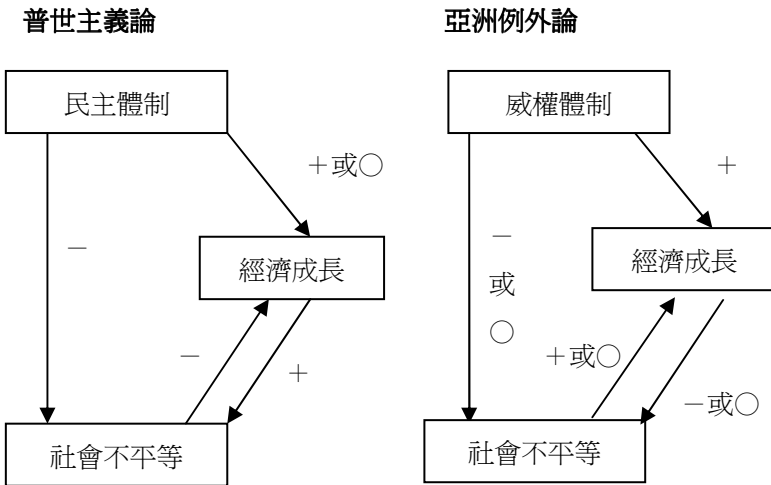
門工人階級的事實 (Deyo 1987; Gereffi and Wyman 1990)。左右兩派對成長的解釋雖有不同，但都可以被視為「普世主義」企圖建立一般理論的分支。

再一次，亞洲四小龍「脫離邊陲」的成長經驗被認為違背了上述的一般理論，因此，部分學者在 1980 年代末期提出了「發展國家」的概念 (Amsden 1989; Johnson 1982; Wade 1990)。發展國家論者認為強大的官僚機構引導資金進入策略性工業，刺激了科技創新，並且透過財政與貨幣政策工具強力干預利率、匯率與物價，以此來保持總體經濟狀況的穩定，有助於經濟成長。但發展國家並非亞洲獨有的現象，總體經濟的干預一直是國民經濟學與凱因斯學派的主張。另一個解釋經濟成長的內生性成長理論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也與發展國家的科技及教育政策有關 (Romer 1986; 1994)，然而本文的數據暫時未能包含相關的衡量標準。此外，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對於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的影響也仍在爭論當中，世界體系觀點與比較優勢觀點可能有不同的結論。筆者無法涉及經濟成長爭論的每一處細節，但「比較優勢理論」、「新古典成長理論」、「世界體系理論」與「發展國家理論」並非完全對立、亦非無法檢證的命題。在本文中，我將以貿易開放度、核心與邊陲國家的經濟指標、以及國內資本形成與政府消費所佔的比例等，作為控制變量，來探討導致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或衰退的動力，這些控制變量有其理論依據，但筆者解釋的重心仍將放在民主與不平等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上。

上述的理論回顧提供了「普世主義論」與「亞洲例外論」之間一些基本論點的比較。兩個陣營在四組假設上有基本差

異：首先，是民主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亞洲例外論認為穩定的威權體制有助於經濟發展，支持普世主義者則認為民主體制至少不會造成短期的負面衝擊，長期表現則可能比威權體制更佳。其次，是經濟成長對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早期的亞洲例外論認為「成長且平等」是可能的，但普世主義則支持經濟成長將導致收入不平等惡化的一般理論。第三，是民主體制對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普世主義者認為民主有助於限制不平等的擴張，亞洲例外論則對此保持沉默，甚或建議威權體制下市場經濟的所得效果，仍可能縮小貧富差距。最後，近年來對不平等的全球研究指出經濟成長將因國內貧富差距擴大而下降，亞洲例外論對此也略而不提。「普世主義論」與「亞洲例外論」兩派的四組對立假設，見圖一：

圖一：普世主義論與亞洲例外論對亞洲四小龍政經發展的解釋



本文的統計分析，是針對普世主義論與亞洲例外論的一次決斷性檢驗，從整體結構來看，普世主義論與亞洲例外論幾乎沒有共通之處，一組在經驗檢驗上若成立，則另一組論點將被棄卻（*falsified*）。但必須審慎說明的是「亞洲例外論」並非整體，實際上各組假設也可以獨立檢驗，也就是說，普世主義論與亞洲例外論的部份假設，仍可能在經驗上單獨成立，表示兩組觀點有部分正確或互補，或者必須尋找新的理論典範來解釋其因果關係。

另一方面需要審慎說明的是本文的推論邏輯：若普世主義論成立，雖然可以作為支持民主政權制度績效及其穩定的論據，不代表威權體制會由於經濟成長稍差或擴大不平等而立即崩潰，這是由於威權轉型與民主鞏固的因果關係大不相同的緣故（Haggard and Kaufman 1995;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威權體制崩潰的理由可能是政體內部的矛盾，例如個人獨裁與軍事政權就比黨國體制（*party-state*）更容易在短期內垮台（Geddes 1999; 2004），而且威權政體轉型的重要原因，例如台灣的國家認同爭議或南韓的地區對抗等，往往也對民主鞏固產生不利影響（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⁹ 總之，即使亞洲例外論遭到否定，只能說明統治績效不佳或許不是亞洲威權體制垮台的重要理由。

⁹ 南韓地域認同政治對威權轉型起了重要作用，卻也導致民主鞏固的困難。請參閱 Kwon 2004。

貳、方法論上的爭議

筆者自行收集了台灣、南韓、新加坡與香港的縱列數據 (Panel Data)，以統計模型來驗證上述的假設。此一做法可以避免全球跨國數據所造成的「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並且在個別國家的時間序列分析上得到更為準確的結果，也就是說，本文要用亞洲數據挑戰以新加坡與台灣來舉證的亞洲例外論。當然，以全球大型數據庫來討論此一問題未嘗不可，但數據的管理方式將大不相同，通常各國的時間序列數據較短，而且會因為其他國家缺乏資料，流失許多詳細資訊，而學術界經常使用虛擬變量來代表東亞國家、南亞國家、東歐地區或穆斯林區域，得到的結論也非常可疑。更重要的是，四小龍的經濟規模、過去的歷史經驗與文化背景類似，與其他超級大國與迷你國家混在一起所建構的全球資料庫相比，所導致的控制問題小得多。

但無可諱言，採用簡單線性迴歸 (OLS) 處理此一縱列數據將會導致三個方法論上的嚴重問題，第一個即所謂的選擇性偏誤 (selection bias) 的危險：由於個案選擇的過程並非隨機抽樣，本文在已知台灣與南韓民主化且吉尼係數偏低，而香港與新加坡仍為威權體制但收入不平等程度偏高的情況下，將會創造出必然的統計結論 (Geddes 1990; Hug 2003)。第二個則是嚴重的內生性問題：由於總體經濟、所得分配與政治體制的互動密切，無可避免將引起殘差項與應變量的高度相關。這兩種統計偏誤，是比較政治與總體經濟學上常見且不易克服的問題。第三個則是小樣本迴歸可能導致的統計偏誤，以及因此衍

生出的「模型依賴」(model dependence)問題：小樣本在不同的模型中結論不穩定，一旦換模型就做不出好結果，因此研究者得以任意選擇對自己的論點有利的模型來呈現量化數據 (King and Zeng 2001)。

在估計政治體制對社會不平等的影響上，我採取三種方式來防止選擇性偏誤與內生性問題。第一種方式是加入上一期的吉尼係數，使之成為時間序列模型 (autoregression)。第二種方式是加入區域的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s) 為控制項，使之成為固定效果模型 (Fixed-effect model)。將這兩個因素加入迴歸分析，可以使得應變量的意義，轉化為吉尼係數在個別地區的年度變化量 (Δ Gini)，而非絕對值。第三種方式則是引用反事實推論「處方迴歸」模型 (Angrist, Imbens, and Rubin 1996; Frangakis and Rubin 1999; Heckman 1979; Rubin 1978; Rosenbaum and Rubin 1983; Winship and Morgan 1999)。「處方迴歸」適用於模型中某些應變量由於自變量而系統性消失的情況，近年來成為對付選擇性偏誤的流行方法。此一模型分兩個步驟計算出結果。第一步以 Probit Model 估計出所謂的傾向比率 (propensity score)，將台灣與南韓並未民主化的機率、以及香港與新加坡民主化的機率帶入模型中，模擬出「若是香港與新加坡民主化」以及「若是台灣與南韓維持威權統治」的吉尼係數期望值，第二步才算出每個自變量的相關係數。在第一個步驟當中，可能導致威權體制民主化的內生變數，如吉尼係數、實質經濟成長率與平均國民所得已經被估計在內。因此，在估計吉尼係數的變化量時，選擇性偏誤與內生性問題可以得到初步解決。

在估計民主與不平等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上，由於應變量(Δ real GDP growth rate)－亞洲四小龍的實質經濟成長率都相當高且經常波動，不易存在上述已知的選擇性偏誤，但由於經濟成長率具有循環波動與時間序列的特質，其內生性問題更難克服。近年來計量經濟學家為處理縱列數據發展出的 GMM 模型，有助於解決各期殘差項與應變量之間的顯著相關。本文採用的是 Arellano and Bond 所發表的 ABOND 模型(Arellano and Bond 1991; Bond, Hoeffler, and Temple 2001)，因此，民主與不平等對當年度實質經濟成長率變化量的影響可以得到相對精確的估計。

筆者選擇處方迴歸以及 ABOND 模型，主要是基於數據的性質與統計學上的新發展。然而在此必須提醒讀者的是第三個問題：本文的統計分析樣本仍嫌不足。作者所收集到的僅有台灣（1959-2005）、香港（1963-2001）、韓國（1980-2005）與新加坡（1975-1999）總計 102 個吉尼係數，其中任何一個地區的樣本都不足以滿足推論統計的需要，因此採用揉合縱列數據 (Pooled Panel Data) 方法 (Hicks 1994)。¹⁰ 在這種情況下，

¹⁰ 本文所稱的官方資料來自下列政府網站：(1)台灣主計處<<http://eng.dgbas.gov.tw/mp.asp?mp=2>>，和<<http://61.60.106.83/ecosoc/CDBMain.htm>>，查閱時間：2006年8月30日。(2)南韓統計局，<<http://www.nso.go.kr/eng/searchable/kosis-list-.html>>，與南韓央行，<http://ecos.bok.or.kr/EIndex_en.jsp>，查閱時間：2006年9月1日。(3)新加坡統計局，<<http://www.singstat.gov.sg/keystats/economy.html>>，查閱時間：2005年11月2日。(4)香港統計局，<<http://www.info.gov.hk/censtatd/-chinese/hkstat/index.html>>，查閱時間：2005年11月3日。官方網站欠缺的部分資料來自 ECONSTATS，<http://www.econstats.com/weo/index_glweo.htm>，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2005) 以及 World Bank 出版的 World Data (1994 ed.) CD，以及 Penn World Table，<http://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61_form.php>，查閱時間：2006年9月25日。

小樣本的不穩定性與「模型依賴」問題就會特別突出。但在筆者嘗試的過程中，各統計模型的結論具一致性，因此仍值得信賴。OLS 及 2 Stage Least Square (2SLS) 的結果將呈現於附錄，提供對統計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參考。

參、數據與測量問題

本文最重要的應變數是吉尼係數與實質經濟成長率，大部分的樣本點來自官方機構或政府網站所提供的數值。筆者以吉尼係數作為社會不平等的測量指標，因此其中的數據信度 (reliability) 問題較為關鍵。韓國統計局在 2004 年以前似乎尚未公開數據，目前僅有個人所得的吉尼係數，¹¹ 新加坡政府的吉尼係數統計資料不連續且不輕易公佈，因此吉尼係數並非官方數據，僅有學者的估計。¹² 台灣的吉尼係數是年度家戶收支調查的結果，香港則是來自家戶普查數據，相對可靠，但香港的普查資料有時每次相隔五年之久，因此僅有 1975 年以來的八個點，這些是數據庫中的主要缺陷。

本文統計模型中最重要的自變量則是民主。如何測量民主是政治科學中的重大問題 (Munck and Verkuilen 2002)，但受

¹¹ 特別感謝韓國統計局 (Korea National Statistic Office) Ms. Lee, Jieun。2004 年底作者寫電子郵件給 KNSO 時該局並未提供數據，但在 2005 年起已經公開研究資料。在筆者 2005 年於香港社會學年會發表的相關研究中，吉尼係數來自 Ahn (1999) 的估計，與官方數據的統計結果類似。

¹² 新加坡統計局公開的少數吉尼係數能在香港科技大學的一篇研討會論文中找到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DS 2002)。近年來對新加坡吉尼係數的最佳估計數據來自 Mukhopadhaya (2003, 41)；另一個估計數列可見 Chia and Chen 2003 (Table 14)，<<http://www.eadn.org/reports/iwebfiles/i08.pdf>>。

限於過去的歷史發展，目前測量東亞民主程度最長的時間序列數據，仍然是來自「自由之家基金會」(Freedom House Foundation)的年度報告，¹³ 本文所用的一到七級政治自由量表(Freedom of Country Rating, FCR)以及虛擬變量「民主」與「非民主」，都來自此一報告的內容，無可避免要面對此一計算方式飽受批評的種種問題。¹⁴

本文對民主的衡量採兩種方式：連續與非連續變量。自由之家的量表被當作連續變量來看待，在 2003 年以前自由之家的量表中，1.0 到 2.5 分之間被稱為自由國家，3.0 到 5.5 分之間被稱為「部份自由」國家，但 2003 年後 3.0 到 5.0 之間是為「部份自由」而 5.5 到 7.0 則是非自由國家。然而，Adam Przeworski 與 Fernando Limongi (1997) 認為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有本質上的差別，因此應該用虛擬變量來處理，本文也從其建議，以「0」代表超過 2.5 分的非自由民主，而以「1」來代表 2.5 分以下的民主體制。¹⁵ 根據 2005 年最新公佈的自由

¹³ 本文主要的民主指標均來自 Freedom House 2007。自由之家最新的網上數據已更新於 2007 年 1 月。引用其他民主測量數據如 Polity IV 的問題是時間序列短，將會使台灣的有效樣本數降到十個以下。

¹⁴ 使用自由之家量表時，最嚴重的困擾是各種不同的測量指數，如政治自由、公民參與等如何加總以及憑什麼加總的問題 (Munck and Verkuilen 2002; Diamond 2002; Munck and Snyder 2004)。

¹⁵ 提醒讀者該文區分兩類政權以利於事件史分析 (event-history) 的做法正是爭議之處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7)，引發後續研究的圍剿 (Epstein et al. 2006)。在此須補充說明的是：在不同的模型中使用連續變量與虛擬變量代表民主，其理論意義不盡相同。用七分到一分的連續變量 FCR 具有兩項特質，首先是 FCR 每年變化有限，標準差較小，對於其他年度變化數值大的應變量，比民主的虛擬變量不敏感，其次是 FCR 代表較為長期漸進的變化，對測量民主或威權體制的長期效果反而比較準確。反之，虛擬變量對 1990

之家數據，依照此一標準來分類，韓國從 1992 年起有 14 個民主年度，台灣則從 1996 年起有 10 個民主年度，之前則屬於威權體制，香港與新加坡的自由程度從未下降到 3.5 分以下，因此全部歸類為威權體制。

在收入不平等的處方迴歸模型中，主要的自變量有（1）控制變量：前一期的吉尼係數與地區虛擬變量。（2）經濟成長變量：模型一以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對數代表經濟成長。模型二當中，筆者加入了金融風暴的虛擬變量、實質經濟成長率、貿易開放度與 FDI 等國內與國際經濟變量。（3）產業轉型變量：服務業占 GDP 比例與失業率。此處值得一提的是：在許多後工業化與全球化對社會不平等衝擊的研究中，吉尼係數與服務業產值高度相關已成爲學術焦點，服務業中的國際金融與房地產等行業的產值擴張，將可能導致一國收入分配的迅速惡化（Galbraith and Berner 2001）。（4）民主虛擬變量：反事實推論的民主化機率 Probit 估計模型來自近年來的重要相關研究，其民主傾向比率（propensity score）已將平均國內生產毛額與其平方、吉尼係數、以及經濟成長率等計算在內（Epstein et al. 2006;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7）。

本文中用來估計經濟成長的 GMM（ABOND）模型，屬於不同的成長理論的變量有：

（1）新古典模型：從所得邊際效益遞減的效果來看，平

年代以後的總體經濟與收入分配的變化非常敏感而且相對不穩定，但是可以呈現政治轉型在迴歸截面上的短期震撼力，然後效果又會隨著民主鞏固的時間而相對遞減。總之，解釋本文的統計結果時，必須小心留意兩者的區別。

均國內生產毛額與經濟成長率是非線性關係，因此平均國內生產毛額與經濟成長率的變化應該是正相關，其平方項與經濟成長率之間應該是負相關，成一個倒 U 型。就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產出來看，國內資本形成（ K 代表資本）占 GDP 比率應該與成長率呈正相關，人口作為勞動人數的指標（ L 代表勞動）亦然，其餘的成長可能屬於科技進步等未能測量的因素（Meier and Rauch 2005; Romer 1994; Solow 1956）。

（2）出口導向因素：許多研究者指出，在勞動力相對豐富與自然資源稀少的地區，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與外人直接投資應該會刺激成長。眾所周知，依賴理論是反對出口導向政策而提倡進口替代最力的理論（Amin 1974; Frank 1969），若出口跟外資與經濟成長為正向關係，則依賴理論將被棄卻。但無論是強調壓低出口部門工資「依賴性成長」的世界體系論（Deyo 1987）或是強調勞動力過剩的比較利益論（World Bank 1993），都會指出相同的出口導向成長現象，兩者並不衝突。本文以貿易開放度與 FDI 金額為自變量，來測量出口導向政策的效果（de Soysa 2003）。

（3）世界體系因素：從世界體系論來看，亞洲四小龍仍然處在「半核心／半邊陲」的區域，一方面強烈依賴核心國家的進口與經濟成長，另一方面必須面對來自其他發展中地區如中國大陸、印尼、馬來西亞等的競爭。但是從比較優勢理論來看，亞洲四小龍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應該是互補與互惠的。本文以金融風暴的虛擬變量（97-99）、美國實質經濟成長率、與中國大陸外資金額為自變量來比較世界體系與比較利益理論，若比較利益法則為真，則中國大陸的外資增加對亞洲四小龍的成

長率會成正相關。若世界體系論為真，則四小龍的經濟變化主要會受核心國家經濟影響，並且與中國大陸競爭吸收外資，其成長率與中國大陸吸收外資金額成負相關。最後，東亞金融風暴的虛擬變量不僅用來作為控制項，同時也代表了金融全球化的經濟後果。¹⁶

(4) 發展國家因素：發展國家理論強調國家對資金引導項特定製造業部門、與總體經濟「宏觀調控」以穩定利率、匯率、物價與工資的作用 (Amsden 1989; Johnson 1982; Wade 1990)。因此，亞洲四小龍政府財政緊縮會與經濟成長平行，或者說財政擴張也隨經濟衰退而來，形成一種反循環操作。¹⁷ 其次，若金融自由化理論為真，則服務業應該能夠刺激經濟成長；反之若發展國家理論為真，則服務業所佔比例顯示工業發

¹⁶ 在 1980 年代，台灣與南韓的發展研究相當程度上是由世界體系論者所主導 (Deyo 1987; Winckler and Greenhalgh 1988)，但在 1990 年代則轉向發展國家 (Allison 1989; Wade 1990) 與產業組織的研究。另一方面，Bruce Cumings (1984) 引用赤松要 (K. Akamatsu) 的日本雁行理論來解釋在世界體系之下的東亞產業關聯，石川城太 (Ozawa 2005) 與小島清 (Kojima 2000) 對此有進一步的闡述，Arrighi (1994) 亦曾直接將雁行論以及世界體系中東亞資本主義的崛起相連結。然而世界體系或者雁行理論如何對總體經濟當中的變量例如：東亞各國之間貿易總額、FDI 的流動以及產業轉型之間的關係，做出可驗證的推論，並且付諸統計檢驗，仍然是個有待解決的議題，石川城太與 Bernard and Ravenhill (1995) 的研究有初步的嘗試。另一種修正世界體系的中程理論全球商品鍊 (Global commodity chain) 則多關注東亞產業組織方面，對總體經濟的討論有限 (Gereffi 1994)。筆者不打算建構出一個世界體系論架構下的統計模型，但求模型中控制變量的統計結果，能夠做為未來總體經濟學或國際關係相關研究的參考。

¹⁷ 在此應該小心的是，許多新古典學派經濟學者會輕易地將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的負相關，解釋為大政府不當的干預導致經濟衰退，但這種說法無法預測經濟恢復成長之後的政府財政緊縮，筆者不傾向新古典的看法，發展國家的「宏觀調控」觀點較貼近此一循環現象。

展政策的衰退，應該對經濟成長率產生負面影響。

(5) 政治與分配因素：民主與不平等是我們測試的重點，若亞洲例外論為真，則民主有害經濟成長，若普世主義論為真，則不平等與威權主義有害經濟成長。我將會在本文模型三到模型六的統計結果中，對各項變數與模型再加以說明。

最後說明本文經濟數據的各種來源及其問題。經筆者核對，大部分的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 (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 IMF) 與聯合國國際發展總署 (UNCTAD) 數據，其實都是收集自官方數據，差異僅在公佈之時間序列不同，可以截長補短，問題在於四小龍官方機構的數據所估計出的「國內資本形成佔 GDP 比例」、「政府支出佔 GDP 比例」以及「私人消費佔 GDP 比例」等，與本文所引用的 Penn World Table (1950-2000) 有所出入，差異可能來自匯率與通貨膨脹率的計算基準不同，經筆者自行計算比對，發現同年度的數據誤差甚大，為求估計方式上的一致性，一律以 Penn World Table 為準，但必須忍受在某些模型中損失 2000 年之後的樣本，筆者說明每個不同模型時都會對流失的年度予以附註。¹⁸ 模型中重要變數的敘述統計與簡單相關係數，詳見表四。最後，筆者傾向採用有較長數據而且自變量較為簡

¹⁸ 最後需提醒讀者的是：表四列出的各變量數量與迴歸樣本數不同，主要是由於台灣的失業率從 1978 年起才有數據、香港與新加坡則是 1975 年起才有失業率數據，因此與基尼係數重疊者只有 81 點，加入前期數據的自迴歸項 (autoregressor) 作為自變量後只能得到 80 個應變量，用 GMM 需要用前二期數據的應變量當成自迴歸項，因此自變量只能得到 79 點，此外，香港自 1997 年之後才有自由之家指數的連續變量，這些都是導致本文各統計模型早年樣本流失的主要原因。

潔 (parsimonious) 的模型做為解釋的依據。

表四：本文各項重要數據的敘述統計

主要變量	Pooled Data： 平均值	Pooled Data： 標準差	台灣 1959- 2005	香港 1963- 2003	南韓 1970- 2005	新加坡 1975- 2003
應變量						
吉尼係數 ^a	0.362	0.078	0.317	0.449	0.303	0.459
實質 GDP 成長 率 % ²	7.17	3.95	7.89	6.69	6.96	6.93
主要自變量						
民主虛擬變量 (0,1) ^o	0.183	0.388	0.213	0	0.5	0
民主連續變量 (7-1) ^o	3.98	1.30	3.87	4.08	3.50	4.69
主要的控制變 量 (內生性成 長)						
國內生產毛 額：十億美元 ²	119019	155967	113547	60650	25300 8	44080
平均每人國內 生產毛額：元 ²	8009	7634	5404	10010	5392	12648
國內資本形成 佔 GDP% ¹	29.98	11.40	18.53	27.52	33.16	47.40
國內私人消費 佔 GDP% ¹	57.22	9.77	60.19	63.37	60.30	40.02
政府支出佔 GDP% ¹	10.64	5.87	18.83	5.75	8.01	8.33
國內人口：千 人 ¹	16259	14562	16888	5046	40323	2988
失業率% ²	3.26	1.35	2.51	3.50	3.68	3.21
主要的控制變 量 (世界體 系)						
貿易開放度： 貿易額占 GDP% ¹	165.69	116.33	77.50	210.75	63.99	356.75
外人直接投資 (FDI)：億美 元 ³	3708	7370	937	7354	1580	5222
美國經濟成長率 ³	3.25	2.04	--	--	--	--

表四：本文各項重要數據的敘述統計（續）

主要變量	Pooled Data： 平均值	Pooled Data： 標準差	台灣 1959- 2005	香港 1963- 2003	南韓 1970- 2005	新加坡 1975- 2003
中國大陸外人直接投資：億美元 ³	14665	20462	--	--	--	--
工具變量 (附錄的 2SLS)						
服務業占 GDP 百分比 (GINI) ²	0.575	0.109	0.522	0.746	0.491	0.631
N of GINI	102		40	13	26	23

資料來源：

- (a) 香港、台灣、南韓的吉尼係數數據為官方計算結果，新加坡數據來自 Mukhopadhaya 2003 (41)。
- (o) 來源為自由之家數據：ANNUAL FREEDOM IN THE WORLD COUNTRY SCORES 1972 THROUGH 2005。
- (1) 來源為 Penn World Table (1950-2000)。
- (2) 來源為台灣、南韓、香港與新加坡官方數據庫，見註 17。
- (3) 來自世界銀行與 IMF 數據庫：http://www.econstats.com/weo/index_gl-weo.htm 以及聯合國國際發展總署 (UNCTAD) 公佈之文件：<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3277&lang=1>。

肆、統計模型與結果

由於數據的數量與特質不同，本文在估計不平等與經濟成長時採用了不同的模型：(一) 吉尼係數的估計採用「處方迴歸」，以民主的虛擬變量作為反事實推論的處方 (Treatment)。

(二) 實質經濟成長率的估計採用 ABOND 模型，以前期的自變量與應變量 (從 12 到 38 期不等) 來估計後一期的成長率。統計結果分別列於表五與表六，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民主與不平等：處方迴歸模型

在處方迴歸中，民主作為一個處方的解釋方式應該為：若是台灣在 1996 年之後與南韓在 1992 年之後沒有建立民主體制，或是香港與新加坡在樣本涵蓋的時期內民主化，其所得不平等的差距。為了控制產業結構與社會福利制度，相對於國內外經濟因素對所得不平等的影響力，在簡化的模型一當中，筆者測試了以下的自變量：服務業占 GDP 比例與失業率、各地區的虛擬變量、以及前一期的吉尼係數。服務業比例代表亞洲四小龍產業轉型－朝後工業社會發展－的效果，失業率亦可能是產業轉型的結構性效應。各地區的虛擬變量用來代表某些影響所得分配但無法衡量的「固定效果」，這些效應可能來自前述的房地產與金融體制等。在模型二當中加入了國內與國際的經濟變量，包括實質經濟成長率、國內私人消費比例、國內資本形成比例、外人直接投資金額、貿易開放度等等。由於模型二所增加的自變量效果極弱、統計上亦不顯著，本文將集中解釋模型一的結果。

由模型一可以得知，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長與產業轉型是影響收入不平等惡化的主要因素。首先，以美元計算的國內生產毛額對數的增長，會導致吉尼係數的惡化，其次，服務業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每上升百分之一，大約會使吉尼係數提高百分之 0.17。第三、失業率的效果在統計上很顯著，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會使吉尼係數提高百分之 0.33。最後，民主顯然有助於改善社會不平等，亞洲四小龍民主化之後的每一年平均可以減少吉尼係數約百分之 3.4。這四個自變量的效果一如普世主義的假設所預期，經濟成長不會自動導致成果篩落的所得

平均效果，恰恰相反，經濟發展將持續擴大所得差距，而民主體制將會限制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惡化。

就統計方法來說，模型二中加入了更多自變量、減少了2000年之後的應變量，排除了台灣7點、南韓5點與香港1點。不幸的是，模型二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整體的Chi-squared，表示所加入的自變量都是多餘，影響原有自變量的效率又喪失不少樣本點，不是有效的模型。但模型二的國內外經濟因素，包括外人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外資的成長、以及貿易開放程度等等，幾乎絲毫不影響吉尼係數的走勢，這雖然與本文的理論脈絡不直接相關，卻也是個十分令人驚訝並值得思索的結論。

近年來世界各國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已經成為「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陣營爭論的焦點，反全球化論者往往認為全球經濟一體化，例如外資增加與貿易自由化等，是社會不平等擴大的重要原因，但懷疑論者（skeptics）往往將福利體系的改變視為國內階級與政治鬥爭的結果，而對全球化的概念與效果本身提出強烈的質疑，甚至視之為協助資本減稅或者增加右派政治影響力的一種意識形態（Hirst and Thompson 1999）。換句話說，國際貿易與投資其實與國內的再分配體系不直接相關。

表五：處方迴歸的統計結果：亞洲四小龍的收入不平等

應變量：吉尼係數	模型一	模型二
失業率	0.0033** (0.0012)	0.0040† (0.0022)
服務業占 GDP 比例	0.1715** (0.0651)	0.1828 (0.1625)
地區虛擬變量：香港	0.0871*** (0.0130)	0.0830* (0.0350)
地區虛擬變量：南韓	0.0043 (0.0055)	-0.0113 (0.0249)
地區虛擬變量：新加坡	0.0918*** (0.0150)	0.0752 (0.0533)
國內生產毛額對數	0.0105*** (0.0031)	0.0172* (0.0077)
前一期吉尼係數	0.3098** (0.1147)	0.2736† (0.1658)
民主虛擬變量	-0.0339** (0.0108)	-0.0477* (0.0157)
實質經濟成長率		-0.0006 -0.0007
外人直接投資		0 (0)
政府支出比例		0.0002 (0.0020)
國內資本形成比例		0.0003 (0.0005)
國內私人消費比例		0.0003 (0.0011)
貿易開放度		0 (0)
中國大陸 FDI		0 (0)
常數項	0.0014 (0.0267)	-0.0551 (0.0947)

表五：處方迴歸的統計結果：亞洲四小龍的收入不平等（續）

應變量：吉尼係數	模型一	模型二
<i>Propensity Score</i>		
吉尼係數	-23.5807* (11.9875)	-30.912 (23.714)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0.0005* (0.0022)	0.0008* 0.0003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平方	-0 (0)	-0 (0)
實質經濟成長率	-0.1064 (0.0878)	-0.0600 -0.0843
常數項	4.9733 (3.8649)	6.1703 -6.9728
風險 (hazard) lambda	0.0140** (0.0054)	0.0217* -0.0087
Wald Chi-squared	4061.85	2389.26
N	80	67

說明：

- (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括號內為標準誤。
 (2) 由於使用 Penn World Table, 模型二不包括 2000 年以後的數據, 減少了台灣 7 點、南韓 5 點與香港 1 點。但除了模型一以外的自變量幾乎都不對吉尼係數產生影響。

本文中有關不平等的經驗證據, 似乎傾向支持「懷疑論」。模型二的結果表示: 至少對亞洲四小龍這些原本已經十分開放的經濟體來說, 全球化導致不平等的各種指控, 例如外人直接投資尋租、WTO 貿易開放或者資金流向中國大陸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之類的說法, 恐怕沒有直接的經驗證據, 所得分配基本上是個國內政治體制, 如民主與否、階級鬥爭、社會福利以及產業結構向服務業轉型的結果, 國內外經貿因素, 最多只能透過產業轉型與失業率兩項因素, 間接對貧富差距產生相當微弱的影響。

總之，處方迴歸模型一與模型二都顯示產業結構與民主體制是影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因，台灣與南韓若維持威權體制，則收入分配會比目前的民主政治之下更為不平均；而香港與新加坡若民主化，則可能會出現減少貧富差距的效果。最後，國際經濟因素與金融風暴的衝擊，長期來看對所得不平等的影響非常微弱。

二、民主與成長：ABOND Model

亞洲四小龍的所得不平等似乎是由內政因素所主導，經濟成長率的模型卻是由國際因素佔較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經濟成長這個議題上，自由經濟學派與世界體系論所持的觀點佔了上風，國內政治體制的變遷則似乎不影響經濟運作。

如同前面的模型一與模型二，由於各個變數的時間序列不同，我設計了時序較長的模型三與模型四，以及自變量較多的模型五與模型六，其中模型三與模型五的民主是用虛擬變量，正相關代表民主對經濟成長的效果是正面的。模型四與模型六是連續變量，七分代表極權體制、一分代表民主體制，因此負相關表示民主化的變動有助於經濟成長。模型五、六不包括2000年以後的數據，減少了台灣7點、南韓5點與香港1點，連續變量又比虛擬變量少了3個樣本。但是從各模型結果的比較來看，其實時間序列的長短對相關系數的方向沒有太大的影響，虛擬變量與連續變量的民主指標的效果也十分類似，同樣是非常不顯著。依據前述簡單回顧的經濟成長模型，我們可以逐一檢視模型三到模型六的各項結果：

(1) 新古典模型：前期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國內資本形

成比率、人口應與成長率呈正相關，但上述的四個應變量中，僅有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在模型五與模型六之中呈現正向的顯著相關，如同內生性成長模型（Romer 1986; 1994）所指出的，經濟成長很難用生產要素的增長或邊際效益遞減來解釋，至少部份必須從內生的科技創新或人力資本的公共投資等制度層面來探討。

（2）出口導向因素：前期貿易開放度與 FDI 兩項，在模型五與模型六當中都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結果顯示出口導向政策與外人直接投資對亞洲四小龍的成長有明顯的貢獻。另一方面，國內資本形成以及國內消費佔 GDP 比例，與成長的關係十分微弱，顯示進口替代的效果有限，出口導向則更有利於增長。這些因素顯示：至少就亞洲四小龍過去三十年的經驗來看，依賴理論貿易妨礙成長之觀點不符合事實，比較優勢與世界體系理論可以得到部分支持。

（3）世界體系因素：金融風暴的虛擬變量（97-99）在各個模型中都出現顯著且重要的負面影響，顯示出全球金融危機對成長的衝擊。前期美國實質經濟成長率的變化則顯著地影響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長率的波動，顯示台灣、南韓、香港與新加坡的經貿發展，強烈地依賴目前世界體系中的全球霸權國家的經濟榮枯。中國大陸外資金額的前期波動與成長，與四小龍的經濟成長率之間，長期成顯著的負相關，這表示台灣、南韓、香港與新加坡做為世界體系半邊陲、半核心的經貿區域，正遭受後進的發展中地區、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強烈衝擊，資本的外移與外資的減少都可能導致四小龍的經濟衰退。用經濟學術語來說，中國大陸對四小龍各產業的「替代效果」，顯然大

於其所帶來的比較利益，對台灣而言，這一點是從比較利益或垂直分工的互補觀點，來鼓吹兩岸經貿大幅解除管制的陣營，所應該正視的事實。

(4) 發展國家因素：政府支出的反循環操作，或所謂「宏觀調控」是穩定總體經濟的工具，這使得政府支出的變化與經濟成長的變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¹⁹ 服務業所佔比例的變化也與實質經濟成長率的變化呈現負相關，但並不顯著。發展國家理論的國家干預與國家對資金投入製造業的引導作用，至少部分是有效的。

(5) 政治與分配因素：民主與不平等是本文的重點，但是這兩個自變量在大多數經濟成長模型當中都不太顯著。首先，在模型三與模型四裡，吉尼係數與經濟成長有邊際性的顯著負相關，在模型五與模型六當中，控制所有經濟變量之後，吉尼係數的效果大打折扣，其相關係數既不重要也不顯著。²⁰ 可以確定的是，亞洲四小龍的貧富差距若長期惡化，很可能會傷害經濟成長，至少不太可能有正面作用。此外，民主的兩種測量指標效果都不顯著，但對於經濟成長同樣是正相關。

¹⁹ 許多新古典學派影響下經濟學者如 Barro (1999) 會輕易地將政府支出擴張與經濟衰退的關係，解釋為大政府不當的干預導致經濟衰退。筆者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是做了一個簡單的測試：使用 ABOND 模型將政府支出改為應變量、經濟成長率改為自變量時，可以明顯發現前一期經濟衰退是下一期政府支出擴張的主因，又政府支出總是反循環操作，因此即使模型顛倒過來，仍會呈現縮減支出導致經濟成長的負相關現象，這顯示政府支出是基於「宏觀調控」的循環預期。

²⁰ 值得注意的是，吉尼係數與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以及服務業占 GDP 比例等變數之間可能有相當嚴重的共線性相關 (Multicollinearity)，這導致幾個變量同時出現時，標準差都被嚴重放大。

表六：ABOND Model的統計結果：亞洲四小龍的實質經濟成長率

應變量： 實質經濟成長率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前一期的成長率	-0.0171 (0.0954)	0.0229 (0.1023)	-0.1425 (0.1024)	-0.1516 (0.1028)
前兩期的成長率	-0.2501* (0.1001)	-0.2098* (0.1054)	-0.4161*** (0.1024)	-0.4200*** (0.1028)
前期美國實質經濟成長率	0.8151*** (0.1607)	0.6833*** (0.1701)	0.6429*** (0.1829)	0.6244*** (0.1843)
前期中國大陸 FDI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前期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0.0007 (0.0005)	0.0004 (0.0006)	0.0015* (0.0008)	0.0015† (0.0008)
前期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平方	0 (0)	0 (0)	-0 (0)	-0 (0)
前一期基尼係數	-44.017 † (22.2283)	-40.4606† (23.5706)	-9.7348 (28.4547)	-12.9907 (28.0315)
前一期民主變量 (模型三、五為虛擬變量)	1.1096 (1.3695)	-0.6269 (0.6098)	1.2303 (1.4130)	-0.5517 (0.6299)
金融危機虛擬變量 (97-99 三年)	-4.5173** (1.3962)	-4.3950** (1.4090)	-4.0253** (1.4373)	-3.8799** (1.4112)
前一期貿易開放度			0.0452* (0.0225)	0.0441* (0.0225)
前一期 FDI			0.0005† (0.0003)	0.0005† (0.0003)
前一期政府支出比例			-1.4726*** (0.4063)	-1.4488*** (0.4065)
前一期服務業比例			-5.8868 (31.4352)	-4.6536 (31.2425)
前一期國內資本形成			0.0344 (0.1074)	0.0334 (0.1076)
前一期人口數			-0.0001 (0.0007)	-0.0001 (0.0007)

表六：ABOND Model 的統計結果（續）

應變量： 實質經濟成長 率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前一期國內私人消費			-0.3172 (0.2237)	-0.3247 (0.2221)
常數項	-0.33606 (0.20216)	-0.31362 (0.20953)	-1.0059** -0.3634	-1.0061** -0.3632
Wald Chi-squared	56.72	41.59	99.53	99.64
Sargan test:	81.54	73.01	51.53	51.57
X-squared	(963) ***	(955) ***	(714) ***	(714) ***
前一期 Arellano-Bond Z-test	-4.02***	-4.65***	-3.25**	-3.24**
前二期 Arellano- Bond Z-test	0.85	0.63	0.56	0.49
N	79	76	67	64

說明：

- (1) “+” $p < 0.1$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括號內為標準誤。
- (2) 由於使用 Penn World Table , 模型五、六不包括 2000 年以後的數據 , 減少了台灣 7 點、南韓 5 點與香港 1 點。

總結模型三到模型六的統計結果，各派的經濟成長模型是互補多於對立，支持出口導向發展的因素得到肯定，但世界體系理論也部份得到證實，雖然過去這兩個觀點經常被當成左右兩派的對立立場來看待。其次，發展國家的論點得到有限的支持。此外，收入不平等的惡化可能會相當程度上傷害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最後，「李光耀假設」認為民主體制有害、而威權體制有利於經濟成長，但是本文即使運用包括了新加坡在內的亞洲四小龍數據，也得不到支持此一理論的證據。總之，在經濟成長議題上，亞洲例外論不符合事實。

三、統計結果小結

從時間序列最長、模型變量較簡潔（parsimonious）而且 Chi-squared 較佳這三個標準來看，模型一與模型三對於民主與威權體制的制度效果有較好的估計。在這兩個模型當中，台灣的樣本為 1978-2005 年，香港為 1976 到 2001 年（五年一個基尼係數），南韓為 1980-2005 年，新加坡則為 1975-1999 年的樣本（原數列中缺兩個年度），四個地區總計共 80 個樣本點，對描述最近三十年內亞洲四小龍的政治經濟表現來說，這兩個模型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模型一的結果顯示：台灣與南韓若是堅持威權統治，則基尼係數會有更明顯的上升；香港與新加坡若是轉為民主體制，則收入分配可以得到顯著的改善。在反事實推論之下，民主制度應有助於改善社會不平等。模型三的結果顯示：前期民主制度對實質經濟成長率的變動有正面但不顯著的影響；前期基尼係數的增加則可能對實質經濟成長率的變化產生相當負面的影響。加入其他的自變量雖然可以改善模型三的整體有效性，但不會對上述變量的方向產生影響。上述的所有結論都傾向支持普世主義論的學說，亞洲例外論的四種觀點：威權主義有利於成長、有利於收入分配；或是威權主義下可能做到成長且平等，或不平等可能有利於成長等四個假設，無一成立。

當然，這是最近三十年內亞洲四小龍當中的 24 個民主樣本的結果，在五十年代土地改革與六十年代經濟起飛初期的歷史資料從缺之下，我們只能有限地支持普世主義論：至少在經歷過第一階段出口導向的經濟起飛期之後，民主化將會有利於

改善社會不平等，而且可能對經濟成長有益或無害。

伍、結論與討論

當台灣政治學與社會學界爲了新興民主的各種問題，例如憲政危機、貪腐問題、民粹主義、族群動員、公民社會與國家認同的困境等，而感到憂心與焦躁的同時，這些困境其實無法解釋民主制度的存續。一方面，本地學者往往受自己潛在的政治偏好與憂慮所影響，從不同的角度批評民主深化之不足，另一方面，對於民主轉型的負面評價，透過亞洲其他威權體制下官方控制的媒體，輸送到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等地的民眾眼前。結果，在這種媒體「哈哈鏡」下，台灣與南韓的民主經驗變得十分難以理解，彷彿政治轉型已經成爲一次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的巨大倒退。

從比較研究的理論關懷來看，威權主義「哈哈鏡」所造成的扭曲，其實是「亞洲例外論」這一面鏡子造成的。這個理論陣營從儒教文化的獨特性或賢能政治的種種預設出發，來解釋亞洲的經濟成長經驗，持續地宣揚威權體制相對於民主體制的制度優勢，結論是民主化將導致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的倒退，遵循亞洲價值才能維護現狀，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威權主義的「穩定壓倒了一切」。

但民主自有其「硬道理」。本文希望能夠澄清台灣與南韓民主制度，在成長與再分配兩方面的基本表現，以擺脫亞洲例外論的迷思，如此，我們才能進一步審視東亞新興民主的成就及其限制。至今爲止，南韓在 1997 年與台灣在 2001 年各自經

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以及憲政體制與貪腐醜聞等危機，從一些老牌民主體制的標準來看，台灣與南韓這兩個亞洲的新興民主政權，確實不太成熟。但是她們仍然生龍活虎地存在著，並且朝向鞏固之路前進，而沒有毀於各種政治經濟災難或軍事政變。可能的理由之一，是她們的統治績效，其實並不遜於那些標榜亞洲價值的鄰居們。

從經濟績效來看，近年來台灣與南韓民主轉型之後與威權時代相比、以及與未轉型的香港與新加坡相比，僅有些許正面且不顯著的差異。但本文中有關各種經濟成長控制變量的統計結果，仍有重要的理論意涵。過去不同流派的發展理論，經常將彼此的論點—如左或右、國家或市場—對立起來，透過個案研究或歷史比較方法，運用不同面向的經驗證據來支持己方的結論。本文的嘗試顯示：引進新的統計工具與更完整的數據，可能有助於澄清過去亞洲經濟發展研究中的許多爭論。在選擇適當的衡量標準與統計模型之後，發展國家、比較優勢與世界體系可能都對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有一部分的解釋能力，差別僅在於比重，唯獨威權統治沒有正面的效果。

從所得分配來看，台灣與南韓在經濟起飛之後，並沒有偏離倒U形曲線的軌跡。亞洲四小龍的吉尼係數在經濟成長中都經歷過爬升的階段，隨后台韓兩地的新興民主政權，在公民社會的崛起與選舉競爭的壓力下，透過福利國家的普及化，相對緩和了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反之，香港與新加坡的威權體制卻由於不受民意壓力左右，而放任社會不平等持續惡化，貧富懸殊可能已經對其經濟發展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在經濟成長方面，亞洲價值下的威權體制並無特殊建樹；在所得分配方面，

民主體制才能保障公民權利與社會安全。從經驗證據來看，亞洲例外論不僅是一組失敗的理論，而且更像是一種維護威權統治的意識形態。

民主的意義，當然不只是物質利益的回報，軍隊的制度化、司法的獨立性、公民文化的建立、社會資本的積累、言論自由的保障、貪污腐敗的治理等等，或許都攸關民主體制的深化，台灣與南韓的表現只能說差強人意，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仍然略遜於香港與新加坡一籌。但是相對於人民行動黨治理下的新加坡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台灣與南韓民主體制在延續經濟成長與所得重分配方面，成就是十分可觀的。

台灣與南韓的政治轉型之路，說明民主秩序與經濟發展以及儒教文化之間並沒有非此即彼的衝突。然而，亞洲的新興民主秩序能否鞏固，而成爲一種普世價值，或許與亞洲的公民文化無關，而取決於民主政體是否能夠實現分配正義的許諾。誠如近年來全球化與福利國家研究的發現，西方民主政體的所得分配效果正在遞減，自由化與私有化導致了成熟民主國家的貧富差距加速惡化。相對於右派自由民主的歷史終結論，左派強調全球治理與分配正義的民主哲學似乎更具說服力（Held 1995）。

脆弱的第三波民主，要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之下兼顧經濟成長與分配正義的目標，仍須面對十分嚴峻的挑戰。筆者並不主張民主的存活與鞏固只能從物質利益的成長與分配來解釋，然而深化民主價值的呼籲，必須建立在人們對其經濟績效的基本共識上，方才合理。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確實比威權主義更脆

弱，因為後者更不需要依賴被統治者的共識。若民主體制的績效不彰，僅僅是帶來另一個貪腐的統治集團，而無法有效治理貧富差距與經濟衰退，則人們仍然有機會推翻現存的民主政權、甚至選擇接受威權統治或軍事獨裁。前兩波民主浪潮的反向運動與現代威權體制興起的歷史（Huntington 1991），至今仍值得我們警惕。

（收稿日期：2007年1月17日，最後修改日期：2007年3月1日，接受刊登日期：2007年3月5日）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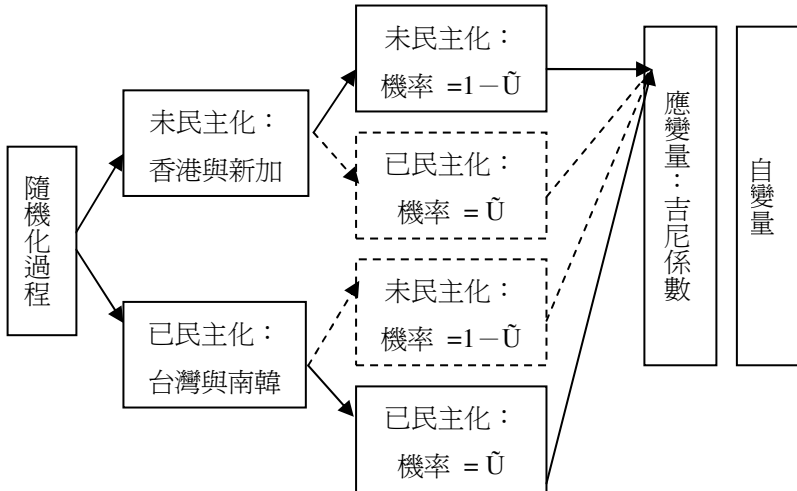
處方迴歸的說明與各統計模型的比較

處方迴歸的原始構想來自準實驗設計的因果推論模型，其發展與運用可以回溯到 Donald B. Rubin (1978) 與 James J. Heckman (1979) 等人一系列統計方法論上的重大進展。附錄將對此一模型的優勢及其「模型依賴」風險做一簡短的介紹。爲了澄清模型依賴問題並未對統計結論造成嚴重的誤導，本文提供了 OLS 與處理內生性問題的 2SLS 模型的結果，提供讀者進一步參考與比較。

處方迴歸分析的邏輯，是以反事實推論來處理選擇性偏誤問題，Frangakis and Rubin (1999) 對此有詳細的推導與說明。以本文爲例，研究方法上的設計可以表達於圖 A1：其中實線部分表示觀察值，虛線部分表示未能觀察到的反事實推論值，在處方迴歸之下，未觀測到的現象已以觀測到現象的機率與內生或外生變量的關係來推算其傾向比率 \tilde{U} ，然後代入迴歸式形成兩者差距的期望值，則更能夠衡量出民主這一帖處方的效果，此一推論在統計上又稱爲「隨機化過程」(randomization)。與 OLS 相比，隨機化過程有很明顯的優越性。若是吉尼係數未能因爲民主而減緩其上升比率，則台灣與南韓若不民主、或是香港與新加坡已經民主，對應變量的效果應該是沒有顯著差異的，但是 OLS 只能推算出實驗組南韓在 1992 年與台灣在 1996 年之後已經民主的效果，忽略香港與新加坡這兩個對照組在降低貧富差距上的貢獻。相對於處方迴歸，此時 OLS 將會高估民主的效果。反之，若是民主化效果比想像中更強大，卻

因為觀測值當中只有實驗組前後的差異，沒有將未民主化的對照組發生政治轉型的機會納入考慮，則 OLS 將可能低估民主的效果。

圖A1：處方迴歸的反事實推論邏輯（修改自Frangakis and Rubin 1999, 368）



在 OLS 的三條迴歸方程式中，吉尼係數模型其實已經放進了前一期的應變量以及地區虛擬變量，應該被視為固定效果自迴歸（Fixed-Effect Autoregression, AR1）模型。此一模型的結果與處方迴歸模型一的結果大部分一致：民主顯著降低了不平等，但迴歸係數的效果僅有模型一的三分之一。有兩個可能的因素降低了 OLS 模型當中民主的效果：不平等反過來降低了民主化的機率，此一內生性未被估計在內，而且民主與國內生產毛額的增長有共線性相關，可能會影響民主的效果。換句話說，即使用上了地區虛擬變量作為控制項，OLS 仍有可能低

估了民主體制降低不平等的效果。

經濟成長的 OLS 模型與 ABOND 模型三的效果也很接近，但吉尼係數在 OLS 模型當中顯著降低了經濟成長率，而 ABOND 模型中的吉尼係數只有邊際顯著，其相關係數卻增加了四倍。其次，民主虛擬變量對經濟成長有正面但不顯著的貢獻。最後，這個 OLS 模型的主要缺點是前期自變量與應變量的動態持續效果沒有納入估計。

民主化機率的 OLS 模型是問題最嚴重的部份：雖然所有影響民主化的因素，如不平等與經濟成長都顯著，也都有理論依據，但線性模型的估計值已經超過了 0 與 1 的範圍，而且也顯示出嚴重的內生性問題：在吉尼係數與民主之間，無論何者作為應變量，都無法通過 Durbin-Wu-Hausman Test 的內生性檢驗。

處理內生性問題的一般方法是用工具變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來擾亂殘差項與應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並且用結構方程式來估計各個不同的應變量，在此筆者使用 2SLS 模型的聯立方程式來展示其效果。在表 A1 中的三個內生應變量是吉尼係數、實質經濟成長率與民主程度，其中吉尼係數的 IV 是服務業占 GDP 比例與失業率，服務業比例與吉尼係數兩者的相關性達到 0.852，而與民主虛擬變量及連續變量的相關係數為 -0.151 與 0.046，失業率與兩者的相關係數分別為 0.0819 與 0.045（詳見附錄表 A1）。實質經濟成長率的 IV 是美國的實質經濟成長率（相關係數 0.277），其與亞洲四小龍的民主虛擬變量、民主連續變量以及吉尼係數的相關性分別為（0.002,

-0.021, 0.027)，在邏輯上與實際上都與其它內生變量近乎無關。換句話說，這些工具變量的統計性質都相當良好，足可減輕 OLS 的內生性偏誤。

表 A1 的兩個 2SLS 模型展示了虛擬變量與連續變量的統計結果：吉尼係數與經濟成長率分別被 IV 所取代，最後呈现在民主化的方程式中，打斷了內生性，但各聯立方程式與 OLS 相比的標準差擴大，導致某些迴歸係數較 OLS 不顯著，這是使用 IV 不可避免的代價。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民主虛擬變量

表A1：OLS與2SLS聯立方程式模型的統計結果

	OLS 模型	2SLS： 民主虛擬變量	2SLS： 民主連續變量
應變量：吉尼係數			
失業率	0.0036** (0.0011)	0.0038** (0.0012)	0.0030** (0.0011)
服務業占 GDP 比例	0.0711 (0.0449)	0.1366† (0.0736)	0.0295 (0.0573)
地區虛擬變量：香港	0.0888*** (0.0116)	0.0869*** (0.0122)	0.0601*** (0.0179)
地區虛擬變量：南韓	-0.0052 (0.0050)	0.0006 (0.0073)	-0.0074 (0.0052)
地區虛擬變量：新加坡	0.0778*** (0.0122)	0.0849*** (0.0141)	0.0549*** (0.0140)
國內生產毛額對數	0.0068** (0.0023)	0.0082** (0.0027)	0.0057* (0.0023)
前一期吉尼係數	0.4870*** (0.0758)	0.3981*** (0.1104)	0.6556*** (0.0949)
民主變量	-0.0106* (0.0108)	-0.0222* (0.0110)	0.0023 (0.0028)
常數項	0.0338† (0.0197)	0.0119† (0.0280)	0.0086 (0.0388)
N	80	80	76
Adjusted R ²	0.9866	0.9869	0.9885

表A1：OLS與2SLS聯立方程式模型的統計結果（續）

	OLS 模型	2SLS： 民主虛擬變量	2SLS： 民主連續變量
應變量：實質經濟成長率			
民主變量	0.2992 (1.3515)	-0.3641 (1.9233)	0.4393 (0.8020)
吉尼係數	-11.8755* (5.3280)	-11.6511† (6.6493)	-14.3504* (7.0650)
美國實質經濟成長率	0.7751*** (0.1606)	0.4896** (0.1824)	0.4828*** (0.1859)
中國大陸外人直接投資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金融危機虛擬變量	-4.0514** (1.4738)	-3.6240** (1.3353)	-3.8711** (1.4738)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0.0002 (0.0002)	0.0002 (0.0003)	0.0003 (0.0003)
常數項	9.5430*** (1.9733)	10.0093*** (2.2699)	8.5095* (4.0683)
N	102	80	76
Adjusted R ²	0.3096	0.3514	0.3582
應變量：民主虛擬變量			
吉尼係數	-2.4318*** (0.4487)	-3.1006*** (0.6220)	7.9780*** (1.5066)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0004*** (0.0001)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平方	-3.37e-09*** (7.10e-10)	-3.57e-09*** (8.97e-10)	1.44e-08*** (2.43e-09)
實質經濟成長率	-0.0168† (0.0086)	-0.0718*** (0.0222)	0.1523** (0.0497)
常數項	0.8421*** (0.1930)	1.4243*** (0.3045)	1.9682** (0.7296)
N	102	80	76
Adjusted R ²	0.4986	0.4536	0.6311

Note：

- (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括號內為標準誤。
(2) 由於失業率的數據有限，使得 2SLS 模型樣本數下降到 80 及 76 個。

對吉尼係數的效果，比原先的 OLS 提高了一倍，民主連續變量則無顯著影響。2SLS 模型的結論與處方迴歸相同，那就是由於內生性問題作祟，OLS 低估了民主降低吉尼係數的效果。²¹ 最後，OLS 與 2SLS 模型的結果都顯示政治體制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十分微弱，其效果非常不穩定，無法支持威權體制或民主體制有助於經濟發展的任一種假設。

然而，捨棄 2SLS 的理由與 OLS 不適用的理由相同：在對民主化機率的估計值上，2SLS 有更嚴重的偏誤，其常數項高達 1.4，但民主的機率只能出現在 0 與 1 之間，這是線性機率方程式無法克服的問題，而且用 Probit 模型當成第一階方程式放進聯立方程式當中，亦即 2 Stage Probit Least Square (2SPLS) 模型，其方程組的最終應變量是民主化的機率，這不是本文關心的重點，也不適合樣本有限的數據來推論。因此，較好的作法是把 Probit 模型當成第二階方程式，再放回吉尼係數的第一階方程式中，這便是本文當中處方迴歸模型的作法。

處方迴歸模型的風險，在於受小樣本條件的約束下，迴歸係數有可能高估民主的作用，也就是前述的「模型依賴」效果。雖然 Gary King 與 Langche Zeng (2001) 曾經為小樣本研究在 Logistic 迴歸的準確性做辯護，但也提出反事實推論的模型裡，小樣本確實容易造成結果的不穩定，並且可能導致估計傾向比率的 Probit 模型出現較嚴重的偏誤 (King and Zeng

²¹ 在 OLS 當中民主對經濟成長率有正面但不顯著的作用，在 2SLS 當中卻轉為負面但不顯著的作用，主要的原因可能是 IV 性質不佳，因為民主虛擬變量與服務業比例成負相關，而後者變成是吉尼係數的 IV，因而可能扭轉了 OLS 當中的關係。

2005)。但是一如 OLS 與 2SLS 結果顯示的，民主體制總是對改善不平等有顯著影響，而且 OLS 確有低估民主的嫌疑。不同模型的一致性可以減輕反事實推論在方法論上的疑慮。

OLS 與 2SLS 模型的第二個問題是無法處理時間序列與縱列數據，只能透過加入地區變量或前期數據的方式，假裝實質經濟成長率是固定效果（Fix-Effect）或隨機效果（Random-Effect）的 AR1 模型。問題在於經濟成長率往往與前兩期、三期的應變量之間有負相關的現象，例如模型三的結果中，兩年前的經濟成長往往與當年的成長率顯著負相關，顯示出經濟活動的週期性波動，但是在 AR1 模型中無法估計出這種動態。因此，符合數據性質最好的統計工具仍然是 GMM 模型，ABOND 是 GMM 家族中流行的模型之一，此一模型由 random walking 的假設出發，將數據中最早一期視為彼此獨立的變量，作為第二期同一變量的工具變量，第二期的計算結果再帶入第三期的方程式，依此類推，則最後一期的應變量與殘差項之間產生相關的狀況得以大致消除。本文所用的模型包括前兩期，數學上可以表達為：

$$E [y_{i,t-s} \Delta v_{it}] = 0 \text{ for } t = 3, \dots, T \text{ and } s \geq 2$$

或

$$E (Z_i' \Delta v_i) = 0$$

令

$$Z_i = \begin{bmatrix} y_{i1} & 0 & 0 & \dots & 0 & \dots & 0 \\ 0 & y_{i1} & y_{i2} & \dots & 0 & \dots & 0 \\ \cdot & \cdot & \cdot & \dots & \cdot & \cdot & \cdot \\ 0 & 0 & 0 & \dots & y_{i1} & \dots & y_{i,T-2} \end{bmatrix}$$

以本文為例，其中 Y 為應變量， i 表示不同的地區，也就是四小龍的實質經濟成長率， t 是數列中的年度次序， ν_{it} 為應變量在兩期之前的殘差項。此一模型又被稱為 first differenced GMM 模型 (Arellano and Bond 1991; Bond, Hoeffler, and Temple 2001)。雖然 ABOND 模型三與 OLS 模型、2SLS 模型的結論相差無幾，但 ABOND 模型以前期數據來推論後期數據的作法，相對確保了時間上的因果關係，並且有效控制了總體經濟學上常見的內生性問題。然而，在本文 GMM 模型中出現 Over-identification 的情形，如何改善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Bond et al. 2001)。

最後筆者須審慎說明，本研究仍然面對以下的幾個重要限制：首先，新加坡與香港的城市經濟與台灣及南韓的國家經濟之區別，在本文中僅以虛擬變項以及服務業佔 GDP 比例來處理，是統計缺陷之一。其次，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長最常被提到的因素之一是人力資本的公共投資，但是這方面的數據仍有待加強。第三，儲蓄率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被忽略，這是由於國內資本形成、私人消費、政府消費佔 GDP 比例的餘數就是儲蓄率，將儲蓄率加入模型估計將產生共線性相關。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本文收集的樣本數不足，未來應加入其他亞洲國家，例如日本、中國大陸、馬來西亞以及菲律賓等地的資料，才能進一步釐清亞洲的經濟成長、政治轉型與社會不平等的關係。過去亞洲的比較政治經濟分析以歷史比較方法為主，已經建立許多有創見的理论，統計驗證卻仍待努力。因此，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 行政院主計處，2003，《中華民國統計年鑑》，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 行政院主計處，2004，《中華民國統計年鑑》，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 吳乃德，2004，〈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國史館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467-502，台北：國史館。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hn, Kookshin. 1999. "Income Distribution, Regionalism and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Korea." In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Asia and the Wilder World*, eds. Ryōshin Minami, Kwan S. Kim, and Malcolm Falku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Alderson, Arthur S., and Francois Nielsen. 2002.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eat U-turn: Income Inequality Trends in 16 OEC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 (5): 1244-300
- Alesina, A., and D. Rodrik. 1994.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May): 465-90
- Amin, Samir.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msden, Alice.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grist, Joshua D., Guido W. Imbens, and Donald B. Rubin. 1996. "Identification of Causal Effects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1 (434): 444-55.
- Arellano, Manuel, and Stephen Bond. 1991.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 (2): 277-97.
- Arrighi, Giovanni.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 Barro, Robert J. 1999.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 (6): 158-83.
- Barro, Robert J. 2001.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2): 12-17.
- Bernard, M., and J. Ravenhill. 1995. "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47 (2): 171-209.
- Boix, Carles, and Susan Stokes. 2003.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55 (4): 517-49.
- Bollen K. A., and Robert W. Jackman. 1985.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4): 438-57.
- Bond, Stephen R., Anke Hoeffler, and Jonathan R. W. Temple. 2001. "GMM Estimation of Empirical Growth Models."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3048. <<http://ssrn.com/abstract->

- =290522> (October 28, 2006).
- Carothers, Thomas. 2002.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5-21.
- Castelló, Amparo, and Rafael Doménech. 2001. "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New Evide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112 (478): 187-200.
- Castells, M., L. Goh, and R. Y-W Kwok. 1990. *The Shek Kip Mei Syndrom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ousing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London: Pion.
- Chia Siow Yue, and Chen Yen Yu. 2003. "Income Distribution in Singapore."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Network. <<http://www.eadn.org/reports/iwebfiles/i08.pdf>> (November 26, 2005).
- Chow, Steven C., and Gustav F. Papanek. 1981. "Laissez-Faire, Growth and Equity-Hong Kong." *The Economic Journal* 91 (362): 466-85.
- Chua Beng-Huat. 1997.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Housing: Stakeholding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 Cumings, Bruce. 1984.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1): 1-40.
- de Soysa, Indra. 200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ssessing Contours, Correlates and Concomitant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Deininger, Klaus, and Lyn Squire. 1998. "New Ways of Looking at Old Issues: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 Development Economics* 57: 259-87.
- Deyo, Frederic C., ed.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arr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arry. 2002. "Think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2): 21-35
- Epstein, David L., Robert Bates, Jack Goldstone, Ida Kristensen, and Sharyn O'Halloran. 2006.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 (3): 551-69.
-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eedom House. 2007. "Annual Freedom in the World Country Scores, 1972 through 2006." <<http://www.freedomhouse.org/uploads/fiw/FIWAAllScores.xls>> (January 31, 2007).
- Fei, C. H., Gustav Ranis, and Shirley W. Y. Kuo. 1979. *Growth with Equity: The Taiwan Ca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ng, Yi. 2003.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ory and Evidenc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Fields, Gary S. 1984.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even Small Open Economies." *The Economic Journal* 94 (373): 74-83.
- Forbes, K. J. 20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 Inequality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4): 869-87.
- Frank, Andre Gunder.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angakis, Constantine E., and Donald B. Rubin. 1999. “Addressing Complications of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in the Combined Presence of All-or-None Treatment-Noncompliance and Subsequent Missing Outcomes.” *Biometrika* 86 (2): 365-79.
- Fukuyama, Francis. 1998. “The Illusion of Asian Exceptionalism.” In *Democracy in East Asia*, eds.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albraith, James K., and Maureen Berner, eds. 2001. *Inequality and Industrial Change: a Global Vie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ddes, Barbara. 1990. “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 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Analysis* 2: 131-50.
- Geddes, Barbara. 1999. “The Effect of Regime Type on Authoritarian Breakdown: Empirical Test of a Game Theoretic Argu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 Geddes, Barbara. 2004. “Authoritarian Breakdown” Working Pape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CLA. <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cms/files/authn_breakdown.pdf> (June 12, 2006).

- Gereffi, Gary. 1994. "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How U.S. Retailers Shape Overseas Production Networks." In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eds.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z. Westport, CT: Praeger.
- Gereffi, Gary, and Donald L. Wyman. 1990.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tephan.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tephan. 2005.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Welfare State." In *Asian States: 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eds.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 New York: Routledge.
- Haggard, Stephan, and Robert R. Kaufman.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ila, Anne. 2000. "Real Estate in Global Cities: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s Property States." *Urban Studies* 37 (12): 2241-56.
- Hamilton-Hart, Natasha. 2000. "The Singapore State Revisited." *The Pacific Review* 13 (2): 200-04.
- Heckman, James J. 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47 (1): 153-62.
- Held, Davi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icks, Alexander M. 1994. "Introduction to Pooling." In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eds. Thomas Janoski, and A. M. Hic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rst, Paul, and Grahame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Malden, MA: Polity Press.

Holliday, Ian, and Paul Wilding, eds. 2005. *Welfare Capitalism in East Asia: Social Policy in the Tiger Economies*.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Hsiao, H. Michael. 1990. "Emerging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Rise of a Demand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163-79.

Hug, Simon. 2003. "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 Case of Incomplete Data Sets." *Political Analysis* 11 (3): 255-74.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im, Dae Jung. 1994. "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 *Foreign Affairs* 73 (6): 189-94.

Kim, Hyung-A. 2004. *Korea's Development under Park Chung He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1961-79*.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 King, Gary, and Langche Zeng. 2001. "Explaining Rare Ev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 (3): 693-715.
- King, Gary, and Langche Zeng. 2005. "The Dangers of Extreme Counterfactuals." *Political Analysis* 14: 131-59.
- Knack, Stephen, and Philip Keefer. 1997. "Does Inequality Harm Growth Only in Democracie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1): 323-32.
- Knowles, Stephen. 2005.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 Re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Comparable Dat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1: 135-59.
- Kojima, Kiyoshi. 2000. "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1: 375-401.
- Koo, Hagen. 200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ng, Lily, and Brenda S. A. Yeoh. 2003.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s in Singapore: Constructions of Natio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Krieckhaus, Jonathan. 2004. "The Regime Debate Revisited: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Democracy's Economic Effec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635-55.
- Ku, Yeun-Wen. 1997. *Welfare Capitalism in Taiwan: State, Economy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uznets, Simon.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 1-28.
- Kwon, Keedon. 2004. “Regionalism in South Korea: Its Origins and Role in Her Democratization.” *Politics & Society* 32 (4): 545-74.
- Lee, Cheol-Sung. 2005. “Income Inequality, Democracy, and Public Sector Siz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1): 158-81.
- Li, William D. H. 1998. *Housing in Taiwan: Agency and Structure?* Brookfield, VT: Ashgate.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Martin Seymour.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69-105.
- Low, Linda. 2004.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A Business Model*. New York: Nova.
- Low, Linda, and Choon Aw Tar. 2004. *Social Insecurity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in Singapore*.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 Meier, G. M., and James E. Rauch, eds. 2005.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khopadhyaya, P. 2003. “Trends in Income Disparity and Equality Enhancing (?)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3 (1): 37-56.

- Muller, Edward N. 1995.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6): 966-82.
- Muller, Edward N. 1988.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1): 50-68.
- Munck, Gerardo L., and Richard Snyder. 2004. "Mapping Political Regimes: How the Concepts We Use and the Way We Measure Them Shape the World We Se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4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Munck, G. L., and Jay Verkuilen. 2002.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Democracy: Evaluating Alternative Indic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 (1): 5-34.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Donnell, G., and P. Schmitter, eds.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zawa, Terutomo. 2005.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
- Przeworski, Adam, and Fernando Limongi. 1997.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 (2): 155-83.
- Przeworski, Adam, and Fernando Limongi. 1993. "Poli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3): 51-69.

- Robinson, Sherman. 1976. "A Note on the U Hypothesis Relat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 (June): 437-40.
- Rodan, Garry. 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gapore's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5): 1002-37.
- Romer, Paul M. 1994.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1): 3-22.
- Rosenbaum, Paul R., and Donald B. Rubin. 1983.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Biometrika* 70 (1): 41-55.
- Rubin, Donald B. 1978. "Bayesian Inference for Causal Effects: The Role of Randomization."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6 (1): 34-58.
- Schedler, Andreas. 2001.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 eds.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en, Amartya. 1999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 Sen, Amartya. 1999b.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10 (3): 3-17.
-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DS). 2002.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equality Measures in Singapore."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Chinese Population and

- Socioeconomic Studies: Utilizing the 2000/2001 round Census Data, Hong Kong.
- Smart, Alan, and James Lee. 2003.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Real Estate in Hong Kong's Regime of Accumul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79 (2): 153-71.
- Solow, Robert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1): 65-94.
- Tang Kwong-Leung. 2000.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 Tremewan, Christopher.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nckler, Edwin A., and Susan Greenhalgh, eds. 1988.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Armonk, NY: M. E. Sharpe.
- Winship, Christopher, and Stephen L. Morgan. 1999. "The Estimation of Casual Effect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25: 659-707.
- Wong, Joseph. 2004. *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oo, Myungsook. 2004. *The Politic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South Korea: Growth and Citizenship*.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Zhan, Xiaobin, Zhang Li, and Sit Tak O Kelvin. 2004. "Income Inequalities unde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44 (3): 442-73.
- Zakaria, F. 1994. "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73 (2): 109-26.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Data of the Four Asian Tigers

Thung-Hon Lin

Ph. D. Candid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competing approaches, namely, the “Asian exceptionalism” and “Universalism,” in regard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tigers. The former argues that authoritarianism based on the “Asian values” has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democratic regimes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By contrast, followi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Korea and Taiwan, the universalism approach claims that the Asian experience is not exceptional at all. In this article, I apply the counterfactual treatment regression and the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using pooled panel data for four Asian tigers over the period 1975-2005.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with the authoritarianism that characterizes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and Korea did not reduce the real GDP growth rate. Moreover, the Gini coefficients for Taiwan and Korea were seen to exhibit a moderate declining because of democratization, while the Gini coefficients fo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soared sharply. Therefore, in terms of growth and equality, the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of democracy is shown to be better than the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of authoritarianism in Asia. The evidence thus supports the arguments favoring universalism,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regards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Keywords: democracy, income distribution, Gini coefficient, political transition, welfare state